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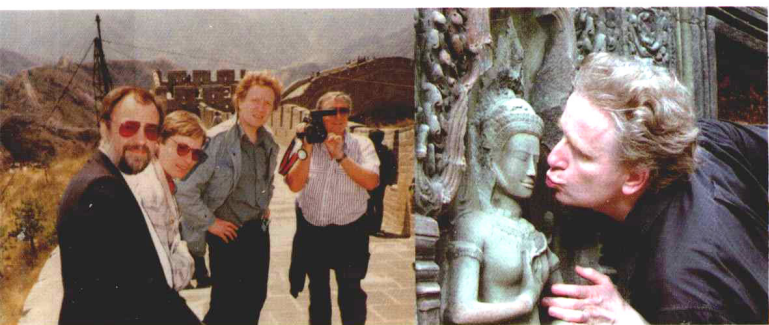
Grenzueberschreitung
—— 35 Jahre in China

穿越界限

一个德国人在中国35年的传奇

Uwe Kraeuter

[德] 乌韦·克劳特 著



穿越界限

一个德国人在中国35年的传奇

[德] 乌韦·克劳特 著

龚迎新 译

~~Grenz~~ueberschreitung
35 Jahre in China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界限：一个德国人在中国35年的传奇/(德)克劳特著；
龚迎新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8

ISBN 978-7-5006-9481-6

I. ①穿... II. ①克... ②龚... III. ①克劳特-自传
IV. ①K83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0503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01-2010-5747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504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00×1000 1/16 23印张 10插页 300千字

2010年10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0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2003年，非典肆虐，北京人的公共生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近瘫痪，人人都被困在家里。就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开始整理自己的私人资料，其中包括信件、笔记、媒体报道、发言稿、采访、电报和照片，从1974年我刚到中国的那一年开始。我希望把这些资料集中起来，归类存档。有好几个星期家里到处都摆满了纸盒、箱子、文件夹和信封，平时整洁的屋子被翻了个底朝天。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能找出这么多的东西。这么多年来我没有扔掉任何东西，在电脑时代之前用打字机打的文件，我都把当时常用的副本仔细地收好；重要的传真也都完好无缺地躺在家里或办公室的书桌抽屉里；所有的电子邮件都在电脑里。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时而坐在地板上，时而坐在椅子上，从这些资料中再一次重温我在中国的生活，我没有办法停下来。很快资料就变成了高高的纸堆，我把每一份文件都按照时间顺序记录在清单上。当非典的危险慢慢淡去，人们又开始逛商场时，我出去买了十个大纸箱，把所有的材料按顺序放了进去，就这样在几个星期的杂乱无章后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井井有条。

一晃三年时间过去了，在2006年的时候我才有了写书的愿望，想把自己在中国的独特生活经历写下来，算一算我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在德国生活的时间。回忆的过程就如同是一次时空旅行，在这漫长的旅行中有些时期写起来并不容易。我一直提醒自己不要用今天的眼光去书写过去，而是以当时的时期、事件和环境为背景尽可能地把我当时的个人体验和感受写出来。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更真实，更坦诚，而且也更吸引人。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我在书中用到的一些引文都是英文或者德文的，现在译者又从外文翻译成中文，在行文和用词上难免与最初的中文有出入。但为了体现历史感及现场感，仍然用作直接引语，敬请读者谅解。

我认识乌苇·克劳特是1995年，在波恩一家中餐馆的朋友聚会上。坐在我对面的他，金发碧眼，很是帅气。当时我任中国驻德国大使。虽然是第一次接触，我却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但更令我惊喜的是，这位当时已在中国生活了21年的西德人对中国不仅有深刻的了解，而且表现出浓厚的友好感情，这在当时还是少见的。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在外交部西欧司工作时，就对乌苇·克劳特这个名字已有所闻。特别是他成功地把老舍的著名话剧《茶馆》搬上曼海姆民族剧院的舞台，并担任了50场现场翻译，使德国观众得以领会剧情。《茶馆》在欧洲舞台上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使我对乌苇产生了敬佩之情。

1997年我奉调回国工作，乌苇曾多次约我商谈组织中德政界人士电视对话事宜，在此过程中我对乌苇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积极致力于在电影、电视、文学、艺术和传媒等领域寻求连接东西方的途径，以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了解。他无疑抓住了当今世界东西方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这部30万字的自传，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乌苇原是1974年应中国外文出版社聘请来华工作的德语专家。作品以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真实地记述了他初到中国时的感受，包括外文出版社对这位“外国专家”热情周到的关怀和当时北京的城市风貌以及中国的社会风尚，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情节使我仿佛又重新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情不自禁地得出结论：此书值得一读！

年轻的乌苇对中国怀有好感，甚至抱有某种浪漫主义的憧憬，但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多年之后，中西文化的差异也不可避免地在他身上显现出来。他对某些问题常常直言不讳，甚至感情冲动，表现出十足的德国人气质，这种

直接率真的态度，让他与单位和同事之间的矛盾与日俱增。在中国工作了近10年之后，就在他准备离开时，他结识了影星沈丹萍。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展和中国朋友特别是一些负责同志的热心帮助，乌苇在中国拥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而随着矛盾、冲突的化解，他也更加理解中国，并且日益融入中国社会，有时甚至如鱼得水。

在书的后半部，乌苇以切身的感受和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中国的巨大变化，而他的活动天地也随之不断扩大。他多次返回德国，同亲朋好友交谈，对于乌苇在德国的朋友来说，他在中国的经历和所做的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他们无不感慨：乌苇每一次从中国来，都带来了一股青春的气息。他们所说的“青春气息”，是指他们无法想象的中国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发展变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环境给乌苇这样的外国人提供的可能性。乌苇在书里还开诚布公地探讨了很多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并介绍了德国人的观点和做法，这也有助于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们相互了解，拉近距离。

基于对乌苇这本书的上述理解，意识到中欧之间加强人文交流的重要性，我十分高兴为这本自传作序。相信中国的读者会喜欢这本书，有兴趣了解一个二十多岁的西方年轻人刚到中国时的体验和观察，他在35年里对中国变化的见证和感悟，他在中国是如何生活、工作和发展的，以及他是如何在中国施展才能，在人生道路上取得成功的。

乌苇同中国家喻户晓的东方美女沈丹萍结为伉俪，从而成了中国的女婿或者说他嫁给了中国。他穿梭于中德两国，努力在东西方文化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他在多方面表现出自己是一个“世界人”。

乌苇是我的老朋友。

说他是“老”朋友不是说他岁数大，是指我们的交情年头长。初次见他时我还未成年，他自己也不过是一个弱冠青年而已，只不过因为是个老外，咱中国人看不出他的年龄。那会儿改革开放还远没开始，跟外国人交往尚属一件有风险的举动，即便这外国人是咱国家请来的专家。我当时怀着一种犯罪般的兴奋去参加了这次由我父母和若干外宾出席的饭局，名义上是给我一个和真正的洋人练习“英语对话”的机会，但说实话我是蹭那顿吃的去了——要知道在那个用粮票的年代里，去“康乐饭庄”撮一顿有多大的吸引力啊！一见面这个金头发的大个子就朝我伸出毛茸茸的大手自我介绍说：“我是乌苇，德国人……西德！”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强调这一点，也许是因为东德“修”了，所以跟中国的关系还不如资本主义的联邦德国吧。我只知道人家真正的英语原来是这味儿的，跟咱平时学的“狼来夫拆门帽”不是一个调。那就跟人家虚心学吧！学来学去后来出国留学，美国人都纳闷为什么这个中国人的英语一股子德国腔。

后来混熟了，乌苇成了我家的常客。不光我的老爸，一干文艺界的明星像赵丹、于是之什么的都跟他成了莫逆，隔三差五的聚。我爹动辄盛赞这个从没学过表演的德国青年，说此人聪明绝顶，悟性奇高，最难得天生不知什么叫紧张，真是祖师爷赏饭，不干演员这行可惜了儿的。听得我这个自视颇

高却一直不得其门而入的梨园子弟甚是不服。不料紧跟着人家乌苇就露了一手：先是随北京人艺《茶馆》剧组赴欧巡演，每到一处都由他现场同声翻译，连说带演，一人分饰各个角色，等于台上几十个老艺术家全给他一人跑龙套，这一趟周游列国风头出大了。接下来又在李翰祥的《火烧圆明园》中闪亮登场，正经演起电影来，不服还真不行。当然最令我们这些圈内外人津津乐道，或者说艳羡不已的，还是他后来和电影明星沈丹萍的爱情故事，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经影迷口传心授、媒体猎奇炒作包括本人主持的夫妻节目客观报道，这故事已被锻造成了传奇，在当今分合不断绯闻纷飞的演艺界熠熠生辉。

如今乌苇夫妇在演艺圈有着更多的莫逆之交，我只是这些朋友之中的一个。非常幸运也十分感激他们夫妇数次光临我的节目并请我来为这部记载了乌苇非凡经历的传奇之书作序。乌苇·克劳特，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动荡年代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先是到外文局，后来又文艺界工作，演过电影，搞过电视，干过同传，还娶了中国的女明星，见证和参与了三十多年来我们国家文艺界乃至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当年的日耳曼小伙子，满头金发早已变成了银丝，他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了这里，他是我们名副其实的“老”朋友。

忝为序。

目 录

序一 梅兆荣 / 004

序二 英 达 / 006

第一章 出发，向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1974年7月16日—18日

001

第二章 投身在历史的大潮中

1974—1975

019

第三章 门的背后很多人在哭

1975—1976

083

第四章 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开启

1976—1978

111

第五章 为留在中国而给胡耀邦书记写信

1978—1979

137

第六章 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1979—1983

159

第七章 “爱情就是爱情，不需要问为什么！”

1983—1987

193

第八章 我真的是在经历一场个人的“失败”吗？

1987—1992

233

第九章 新的探险：追寻往昔的辉煌

1992—1997

275

第十章 “我们会用全新的眼光看世界。”

1997—2009

299

结束语 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之间：没有损失，无可比拟！

349

感 谢

358

参考书目 (Bibliographie)

359

1974年7月16日—18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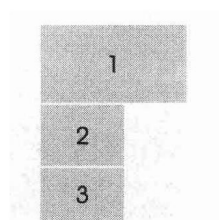
第一章

出发，向着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

来中国前夕和继父、母亲、外婆合影留念



1. 美丽的海德堡
2. 我的大学
3. 和从小的玩伴——老友托马斯



人生中的重要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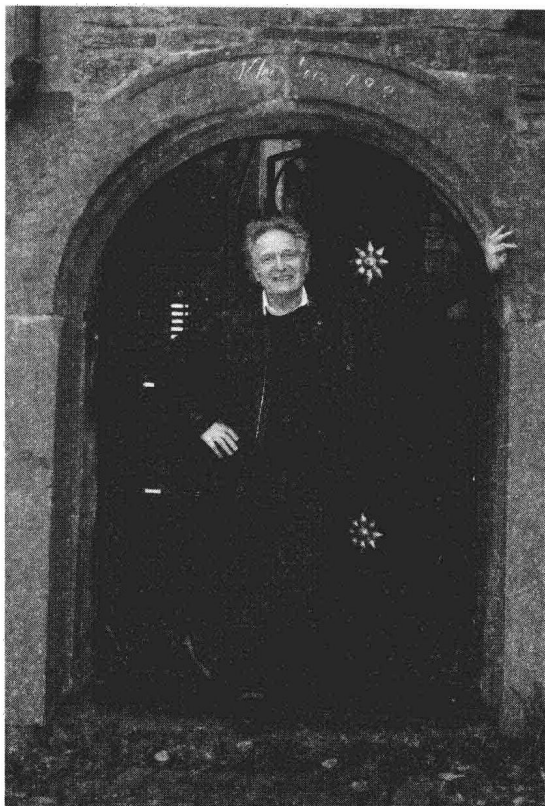
1974年7月16日，星期二，中午时分。海德堡。

我刚刚去过银行，把仅有的一点儿积蓄都取了出来。我站在马歇尔街和豪普特街的交叉路口边，看着从我身边侧身而过的人流。中午时分这个地段总是人来人往，人们好像在比赛看谁走得快。当路边的人行道上已经没有落脚的地方时，有的行人干脆走到机动车道上。我终于把出发前要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但是还是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我感到很累。车辆排成长龙，缓慢地向前挪动，自行车在车的夹缝中曲折前行。马路对面是我经常光顾的一家小面包店，除了买面包外有时我也在那儿买果酱和香肠。面包店后面的马路向远处蜿蜒，一直伸展到天佑教堂。天佑教堂突兀地站在道路的尽头，好像是硬要给路边很气派的两排房子画上一个句号。教堂后面就是老城，我敢确定地说，一到晚上在任何一个餐馆里我都至少能碰到一个认识的人。我所在的学院就在那边，具有古典主义风格的学院大楼由大块的沙石建成，凸窗和拐角的挑楼伸向大街。到今天我才发现这座楼原来这么漂亮。大楼后面是古色古香的大学主楼，通过广场连接着新校区的几座教学楼。映衬在远处暗色调山坡下的教学楼看上去颇为壮观。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如此的亲切，如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老朋友，同时又让我觉得离得很远，好像我正在回视自己的过去。我的心隐隐作痛。

在豪普特街的对面是格拉本街，大部分住在老城里的大学生都经常光顾那里的洗衣房。我们常去的书店也在那里，走到路的尽头就是大学图书馆。图书馆上方的铜制屋顶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穿过弗雷德里希-艾伯特公园可以直接进到城堡山的地下通道，假期里我曾在那里的工地上刷墙，当时

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一天我和其他几个工人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架子晃得厉害，好像随时都会塌下来。可恶的工头不但不帮助我们，还站在安全的地面上对我们不停地指手画脚，我一气之下把活儿给辞了。从地下通道向上延伸出一段台阶，路过警察局，马路继续向左延伸通向城堡。如果再向前走的话还有一条近路直接到克灵根塔希街，在那里有一座 1650 年修建的小钟楼。我刚开始上大学的时候就住在那附近的一栋楼里，石拱楼门的上方凿刻着“1843”的字样。胖胖的女房东也住在里面。房子的一边是一座犹太墓地，我从来没看到有人进去过。我的房间在四楼的房顶下面，小得可怜，带一个洗漱池，但是从窗户里可以一直看到王座山。门口的克灵根塔希街路面很陡，害得我不得不把雪铁龙 2CV 的车头抵在一棵高大的橡树上，免得它自己滑跑。这种车在熄火的时候挂一挡没有刹车的功效，而且手刹也不灵。手刹不灵不能怪别人，是我自己没有钱去修理。后来我搬到另外一间面积大一些也稍微亮堂一些的房间里，就在马路的对面，离纳可草坪只有 50 步的距离。美中不足的是做饭的地方在卫生间的一个角落里，时间一长有些难以适应。加上后来和房东又闹了矛盾，虽然我按时付了房租，他却把电给掐了。我迫不得已去法院告他，强制他恢复供电后问题才算告一段落。估计在那里也住不长了，我就开始在外面留意是否有类似的房间，后来在市中心靠外一些的法芬格顿区找到了。两个月前，也就是在 5 月 15 日我搬进了新家，但从一开始就知道在那里不过是暂住而已。我在一家租车行里租了一辆大卡车，自己开着车把双人床垫、一张用了很久的书桌、几个书架、两块地毯和一台黑白电视机都运了过去，当然还有一直陪伴着我的磁带录音机、唱机和唱片。最后我把不用的书和文件存放到了父母的家里。

新家确实不错，不但门前有一块儿小花园，后面还有后院，很适合在外面烧烤。只是最近我的心里总是忐忑不安，中国大使馆那边又不知为什么对我时冷时热，让人无所适从。我越来越觉得这可能和我的案子有关，其实从年初到现在他们一直都是这样举棋不定。他们把我叫到波恩的大使馆里去谈了好几次，其中有两次都告诉了我机票的日期，但是每次又在过了几个小时后打电话通知我说机票取消了。五个星期前他们还亲自来了一趟。他们把大使馆的轿车停在了几百米远的地方，然后徒步走到我的家门口。来访的是一男一女，都穿着深色西装，他们说不希望附近的居民看到使馆的车号后对我



石拱楼门的上方凿刻着“1843”的字样。2008年故地重游。

议论纷纷。两个人的态度十分友善，对于我家里的简朴设施也感到很满意，尤其是我的床垫不是放在床上，而是直接摆在地上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等待消息的那几周里我为了能分神不停地看侦探小说，其实我平时不太喜欢看这类小说。当终于知道真的要走的时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在最后的两天里我开着福特家庭车把新家里的书、文件夹和唱片分批运回了罗世镇我父母的家里，他们一直保留着我的两间屋子。

有轨电车的铃声打断了我的思路，我下意识地回退了一步。电车紧擦着路边的石阶开过。我再一次环顾四周，眼神几乎是贪婪的，我真想把每一个细节都永远记住。天气实在是太好了，我不仅暗暗地诅咒：哪怕是下一场雨也好啊！在这里阴天是常事儿，为什么偏偏今天不是！让我感到更可恶的是这里的生活看上去似乎很好！我转过身沿着马歇尔街向下走到我的车边，每走一步都能清楚地感到脚底和地上碎石路的接触。大学食堂在书店的左边，

一群大学生正从那里走过来，其中一个人向我打了个招呼。我们打招呼不是那种客气的低头致意，而是看着对方自豪地把头向上一甩。我也以同样的方式回了礼。

几周前我去曼海姆，到《共产主义人民报（KVZ）》和大家告别，那一天阳光明媚。他们的话不多，只是说这是你自己的决定。可能他们也不知道该对我说些什么，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这和我想象的差不多。报社的总编辑波尔卡特·布朗贝亨斯和往常一样穿着格子衬衫，说话的口气也和往常没什么区别：“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给我们写文章啊。”

决定是在半年前作出的，当时我正在法国南部的小城安提布。从18岁开始我就经常去安提布，最开始的原因是想接近玛丽-克洛德。只要她的长途电话一打过来而我又正好有几天的空闲，我就会跑过去一趟。这次去安提布是在圣诞和新年之间。我没有考虑太多就动身了。不安的情绪一直笼罩着我，但是我不断地安慰自己（我确实也是这么想的），我应该多想想曾经是海员的外祖父，作为他的后人我不能这样经不起事。我已经28岁了，我应该清楚眼前这个机会不但意味着梦想成真，也意味着希望和探险。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将向我打开大门，我怎么能拒绝呢？虽然这将彻底改变我的生活道路。两年的时间听上去很漫长，令人胆怯。谁又能说得清楚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昨晚我在晚会上见到了我的印度朋友善他努·穆克吉。他也是一个大学生，我们俩最初是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认识的。在加尔各答我见识了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见到的贫困和异国情调。1971年我在印度待了三个月，主要目的是去为我的博士论文收集一些资料。论文的主题是比较中印两国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不同，侧重于中国在1949年建立共和国后和印度在1947年独立后的比较。初次和善他努见面时他就请我到他那儿去住，然后二话没说拿起我的行李，把我从一间虽然有些破旧但富有殖民时期特色的旅店里直接带到了他的家里。他的家不大，但还有一张空床供我休息，他的母亲和妹妹舒米达跟他住在一起。在善他努的帮助下我结识了一些当地的地下知识分子，接触到当时遭禁的《解放》期刊。他还把我带到著名的电影导演莫利奈·森家里，在那里森给我们放了他当时的最新电影《采访》。在那段时间里，所谓的东巴基斯坦在血腥的屠杀过后从西巴基斯坦脱离出来，

成为孟加拉国。加尔各答的人们对此感到无比的愤慨。一天善他努和我坐火车到 60 公里之外的边境城市波噶，下了火车后又坐人力车加步行到了人烟稀少的边境。边境上只有一个不善言语的男人站在一棵树下，他没有穿制服，气氛有些压抑。在回来的火车上我们只买到了硬座车厢的车票，我是那里唯一的一个外国人，情况突然变得很紧张。没过多久就有一个人走过来愤怒地对着我大喊了一句，说我是美国来的间谍，而美国人要对在那里发生的屠杀负责任！他的话音刚落车厢里就炸开了，人们异口同声地用英语和孟加拉语来骂我。只有少数人没有参加对我的口头攻击，大部分是妇女，他们把头深深低下，盯着地面。我试图为自己辩护，说我是德国人，而且我是“孟加拉胜利”组织的同情者，但都无济于事。他们继续骂我是帝国主义的间谍，没有资格把“孟加拉胜利”这个词挂在嘴边。我感到车厢里的气氛越来越危险，不敢再开口了，我越辩解他们可能会越愤怒。坐在我对面的善他努一面苦口婆心地劝大家要保持冷静，同时还要十分谨慎不要把自己也搞成替罪羊。在忐忑不安中我们挨过了不知多长时间，火车终于到了达姆镇。大部分的人在那儿都下了车，我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善他努后来到了德国，他成熟了不少，人也更聪明了。在德国他活得如鱼得水，就和在自己的故乡一样。在昨天的晚会上他简单而不无自豪地对我说：“在人的一生中有时候就是要发生一些变化嘛！”

他的话一直在我的耳边回响，好像是对我目前心情的一个客观总结，隐含着一种必然性。动荡中的一颗心似乎又找到了依靠。

到了家以后我先上楼到自己的屋子里去收拾行李。外祖母也住在二楼。看到我后她说，你终于回来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赶快去收拾行李吧。是的，我知道，我一边说一边走到阳台上。阳台的下面是一片花园，种满了树木和花草，在后面还有几棵蔬菜。我的父母最中意的是花园正中间的一棵雪松，还有阳台右边的一棵桦树。两棵树都还小，两米高左右。我喜欢更高一些的树，最好还是那种有外国名字的。我一直忘不了当时我们一起去奔斯海姆的苗木场买树的情形。回来的路上我们把车后排的椅子拿了出来，然后把树横插进雪铁龙车的后座箱里。巨大的树冠伸出车外，看上去很气派。我开车回到罗世镇时，路边的一些行人竟然给我鼓了掌。哎，到了那边我肯定会想念这几棵树的！我